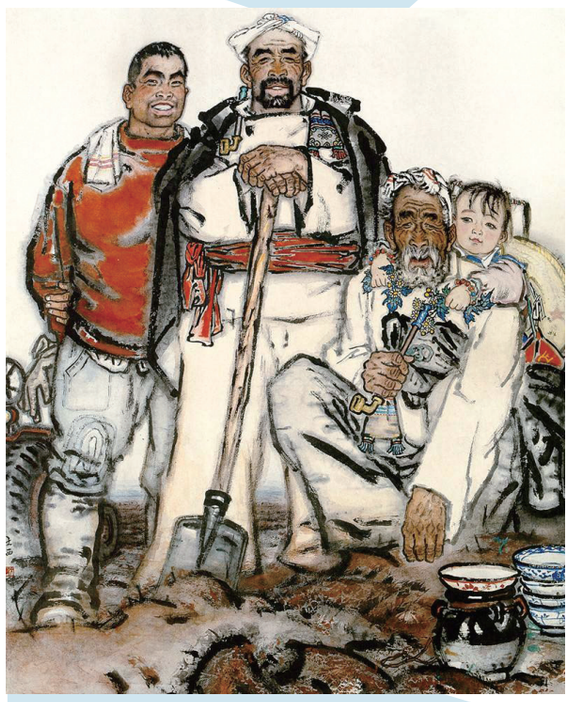
人物

远去的丰碑 ——纪念刘文西

□彭时雨

毛主席和牧羊人



祖孙四代

美术教育家，当代中国人物画大师，黄土画派创始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顾问，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当代画派联谊会主席，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文西，于2019年7月7日13时5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

刘文西1933年生于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水竹村，曾受教于潘天寿等人。1958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1991年至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2004年至去世前一直任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主要作品《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欢共乐》《祖孙四代》《黄土情》等早已被奉为经典。他画的《毛主席像》也被印在了第五套人民币上，成为最广为流传的作品。教学工作、领导职责、社会活动、深入生活、创作实践，构成了刘文西全部生活的紧张节奏。他在长年的苦乐中得出一个道理：你要创作吗？到生活中去。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他们会启示你怎么创作，路该怎么走。

刘文西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创作充分展现了他的“独到之处”。其中有画家表现领袖、歌颂人民的作品，也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坡的人物写生，画家突破了中国画已有的审美程式，创造性地吸纳西方现代艺术的成就，在东西方艺术大交流中开拓中国水墨画的新领域。

为毛主席画像

学生时期的刘文西就很崇拜毛主席，他常对人说：“毛主席很伟大。”正是因为对毛主席的热爱，几十年来他收藏了毛主席的许多照片。“画了一辈子毛主席，但我从未见过他本人。”刘文西曾坦言，他所有作品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照片所刻画的，虽显遗憾，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领袖情结。刘文西的重要作品有《东方》《毛主席和牧羊人》《解放区的天》和巨幅系列长卷《黄土人》等。当然，刘文西笔下的毛主席，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是人民币上的头像。目前使用的5元、10元、50元、100元上的毛泽东头像都出自他笔下，但仔细看还是有些细微差别的，刘文西说他最喜欢的还是100元的那一张。

他的成名代表作之一《毛主席和牧羊人》，画面中的老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毛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侃侃而谈；而主席面带微笑、神情专注地倾听着老农的絮语，就连指间的烟灰都忘了弹。这幅画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刘文西的领袖情结，可以说挥之不散。1997年，刘老作为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设计第五套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人员就找到他，请他为新版人民币画像。当他领了为100元人民币画毛主席像的任务后，无比激动，夜不能寐。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精心选照片，专心创作，这一画就是20多天，经过反复修改，方才定稿，并最后通过中央领导的审定。

刘文西画领袖，凭的是发自肺腑的爱戴之情。这么多年来，他对毛主席的敬仰从未有丝毫改变。当年在中学课堂，刘文西第一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对他的人生和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正因为此，刘文西用了50多年走遍陕北。在那里，刘文西自然而然地和普通百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黄土情（局部）

为人民画像

刘文西一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策，坚持不断地深入生活，不断地艰辛创作，在生活中画了大量速写，达两万余张。他以陕北为生活基地，先后去了610多次，每年花不少时间泡在这块浩瀚而浑厚的黄土地上，与陕北人民交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大量的作品中力求描写陕北人民的特有个性和气质，创作了大量关于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风土人情的作品。

当刘文西第一次看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就坚定了自己一生的艺术信仰。1957年，大学还未毕业的刘文西来到延安。在延安，充满好奇的刘文西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不断寻访，他被共产党人那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深深地感染着、打动着，而这块黄土地上勤劳、勇敢、朴实、善良、赤诚的人民，也让他魂牵梦绕。1958年以来，刘文西先后100多次深入陕北，走遍了陕北26个县的山川沟壑，20多次在陕北过大年。在陕北，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真心真情同陕北人民相处，与老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作了大量陕北题材的作品。

一束野花

在人物画创作实践中，早年受到潘天寿的教诲，他吸取了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中的线描造型技艺，又借鉴了西洋构图和明暗对比刻画人物的手法，将西洋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中国画，从而形成了刻画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人物画笔墨技巧方面，他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结合起来，在造型上吸取西画中素描和色彩的精华加进民间艺术中清新健康的朴素格调，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刘文西画老农形象多用焦墨干皴皱纹，染以淡墨表现结构，最后赋彩润色，色墨结合恰到好处；画姑娘形象则重染色，能够用不露笔痕的饱色表现面部皮肤的新鲜圆润。总之他的人物画与一般国画“人物”大不相同，有的寄托了他对杰出人物的仰慕，对他们的理解与想象；有的表现了对正义，对真理，对真情，对光明幸福的憧憬；有的是对劳动者创造世界的热情讴歌；有的是对人生社会的深刻理解与关注，表现出他在艺术上的游刃有余。

刘文西常说：“我对西北的艰苦生活心存感激，我热爱这里的人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是我艺术创作的力量和源泉，也是我生命的依托。”

为时代画像

刘文西的艺术宗旨是：“熟悉人、严造型、讲笔墨、求创作”。所谓熟悉人，就是决不概念化地画人，无论陕北人或西藏人，都要抓住其鲜明的个性和共性；严造型，就是严格地塑造人物形象，主要是现实主义地吸取西画中科学的造型技巧；讲笔墨，就是坚守中国画艺术的学术底线，拓展传统笔墨的表现力；求创新，就是在前面三项即生活、形象、笔墨语言过硬的基础上，探索出不重复古人、洋人、前人和自己，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卓有新意的国画。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创作的《祖孙四代》，以“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塑造的生动性和笔墨技巧的开拓性”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此后又创作出一幅幅关注社会、关注人类、关注生命的陕北系列作品。从《毛主席和牧羊人》至《同欢共乐》，从《支书和老贫农》到《沟里人》，他不断在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寻找感动自己的题材，进行典型化的思考与提炼，并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绘画创作能力去刻画人物和处理作品诸要素的协调整合，力求达到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的完美统一。

刘文西人物画的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人物群像有一种有机的整体关系，形成了内在的张力。品味刘文西的作品，深感作者是画中的小说家与戏剧家。尤其是他的巨构《黄土情》《陕北人》，长度达28米以上，所绘近百人物，个个栩栩如生，维妙维肖，人物的表情、动作、体态、正反背侧，以及人物之间的呼应、人与景之间的关系，乃至群像所连成动态的变化，人物的疏密起伏与姿势表情，构成了戏剧的情节，内在的张力。

刘文西的创作与传统文人画中表现失意落魄的封建文人与官僚士大夫消极、颓靡、乏味无聊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表现黄土地人传统文化精神风骨为主题，他作品中的“黄土地文化”已经被彻底的中华民族精神化了。由于他的艺术创造，使得黄土地成为中国人物画中一个永恒的艺术图腾，它不仅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一批批画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刘文西坚信“我们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一定要有作品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刘文西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用画作走过每一个时段的，他的画迹和履痕重叠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尤其是他创作的大量以延安为题材的作品，都是他扎根生活的具体表现，作品中的地域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叠加，包括他笔下那些有着“符号特征”的生动的形象，成就了刘文西艺术的独特魅力。在他的引领下，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认同、接受、追随刘文西的画风，以黄土地的普通人物、景物为审美取向，在现代中国画坛形成了重要的、具有鲜明独特画风的“黄土画派”。

维护文化遗产的荣誉是不可推却的责任和担当

□陈履生

视觉前沿

文化遗产是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分布在世界各地，尤以文明古国居多。文化遗产是人类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伟大创造，因此，对于它的发现、保护、认可以及利用都非常重要。文化遗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人们如何认识，不管认识的或高或低，它都在那里成为一种不可移动的文化标志。联合国这一大家庭通常用一种共同的标准来权衡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把最优秀并具有独特性的、符合共同价值观的那一部分精选出来，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名录之中，成为所在国和全世界共同保护的对象。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担当；这之中需要有荣誉的维护，也需要有责任的担当。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不仅有中国的良渚古城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批准的还有韩国的儒家书院（9处），这确实让国人为之一惊。因为书院也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早在唐玄宗时期的东都洛阳紫微城就有丽正书院，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书院到宋代形成高峰，最著名的四大书院流传至今的有岳麓书院等。此次入选的韩国书院建于16至17世纪，相形之下，不管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肇始，还是书院的发端，将中国置于此名之外亦是不堪。国人可能不屑，因为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多达37项，而韩国只有14项。无疑，这样的比较是不合适的。应该敬佩韩国在申遗中的执著，早在2015年申请书院入遗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驳回申请，认为就儒家书院而言，韩国难以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无法彰显其独特性”。然而，时隔6年之后入选名录又如何彰显了其独特性？如果仅仅是完善了申请内容，那么，这样的审批是值得玩味的。

缅甸蒲甘古城的申遗历史又是另一种个案，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1995年开始，到为了申遗而颁布《文物保护法》，并划分了蒲甘文化保护区，依法进行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本次通过蒲甘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表现了缅甸为申遗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对于遗产积极保护的态度，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联合国和有关专家在内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或改变——要尊重文化遗产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以及宗教文化的特别问题，而不只是不加区别的“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以及保护的种种问题。显然，像蒲甘古城这样的案例确实比较特别，因为它关联了这个佛教国家的文化遗产的状况、文化遗产在现实中的功能的发挥，以及其他方面的具体问题。缅甸蒲甘古城的文化遗产与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那一望无际、数量众多的佛塔没有被废弃，它也不是考古发现，它一直有着与当地民众关联的宗教功能的传承历史和现实，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正是这一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的特别的内容。所以，在曾经有万余座而现今剩下的3822座佛塔中，今天依然是缅甸人供奉、贴金、续建的对象。而其中没有规划的无序本来就是它的文化特点，何况保护区内还有68处旅馆，连接了这个佛国之外的无数朝拜的信众。因此，区别对待可能就成为文化遗产名录审批的另外方面的权衡，正如同韩国儒家书院入选一样。

在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和认定中，有着对于标准的把握和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问题，韩国的儒家书院和缅甸蒲甘古城的入选足以能够说明。亚洲地区本次获得世界文化遗产认定的在总体上数量较多，日本、缅甸、印度、印尼、老挝都有，反映了在亚洲不发达地区或者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受到高度的关注。而入选的印度翁比林煤矿则反映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于“文化”认知的不同方面。显然，基于人民创造、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入选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通常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创造的鬼斧神工，可是，由荷兰殖民政府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发的翁比林煤矿，主要是开采、加工和运输苏门答腊这一偏远地区的优质煤炭，其煤矿开采系统实现了当地煤炭的高效深孔提取和加工，反映了殖民者对于印度物资资源的掠夺，开采技术的先进，以及整体规模的宏大。它作为近代工业，在全世界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可能并不突出，但是，它完整保存到今天并显现出如此的规模，则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实际上也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对于这样一种几乎是眼前历史的近现代工业遗址的认识、保护和利用，过去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偏差，特别是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废弃、重建或改作他用等等，使得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眼前消失。而那些在电影中出现的旧城和街区，只能成为历史的回忆和感情的寄托。

文化遗产的发现和认定很重要，有效的利用从而体现其价值，同样很重要。比如巴黎利用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工程而建立的“下水道博物馆”，还有那表现出对逝者尊重的“地窟博物馆”，都属于与印度翁比林煤矿旗鼓相当的文化遗产，可是，它们并没有出现在“名录”上。因此，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出现在“名录”之内的大都可以理解，而对“名录”之外的如何认识和认定，依然是一个问题。无疑，是不是在“名录”之内，实际和境遇是大相径庭的，有着明显的差距。一般来说，出现在“名录”中的往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而那些零星的不具规模的却对历史和文化相当重要的遗产，缺少关注和支持则是这个“名录”的局限。显然，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国家的现实状态相关联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谈不到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谈不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质量。所以，像伊拉克屡受战争摧毁的文化遗产那样，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损失，更是全世界的灾难，而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在世界的知名度也大打折扣。

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中国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国的文化遗产数目在全球居领先地位，这和政府日益重视文化遗产工作有着紧密的关联，当然，也反映了公众对于文化遗产认知水平的提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各个国家以及各个保护单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状态和保护水平是不一致的，有高有低，这很正常。对于中国来说，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关系到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水平。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等多方面的相互关联中，如何从过去积极申报转向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当然，利用的水平和利用的限度，也考验着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像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中尽可能拒绝现代人工的加入，护栏以及公共洗手间等在这里都没有，更谈不上在遗址内摆摊设点。这里的商业区远在山下的集中区域，而上山则是通过保护区内的公共交通。另一方面，处于原始状态的上山古道则是全世界驴友的共同目标。这种开发利用的水平不在于现代化的设施，不在于各种便捷或周到，相反，不便捷、不周到就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个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所以，每一位造访者到此都不会有任何埋怨，因为共同面对的是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必须付出体力，必须面对这种不便捷和不周到。

文化遗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是无时不在的。如何去除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关系而突出保护优先这一原则，这正是我们今天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和基础认识。在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遇到遗产保护这样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在中国，文化遗产基本上都对公众开放，都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然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众开放之间的矛盾，以及文化遗产在公众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种种关系，应该如何来协调和处理？如何在一定限度范围之内做到开放与保护并举？文化遗产的开放与公园等其他旅游景点的开放是完全不同的，如何表现出这种差别，而让文化遗产在开放中能够有尊严地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景区的存在，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仅仅依靠门前那个醒目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

而在现实中，遗产的教育和遗产的研究同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何将遗产的开放和教育结合起来，扩大文化遗产认知度中的文化内涵，这之中公众受教育的普遍程度都取决于遗产开放的水平。当然，遗产研究更为重要，因为保护是一方面，研究是另一方面，且研究是保护的又一方面。只有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显现出保护的意义，才能提高保护的质量，也才能显现出教育的本质。所以，不管是遗产教育，还是遗产研究，对于当下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申报那些处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的61项遗产，另一方面要积极做好遗产的教育和遗产的研究工作，从而提升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贡献。